

道南論衡

飲食書寫的政治想像： 論《飢餓》、《美食家》與《酒國》

賴志豪*

摘要

中國飲食文化博大精深，一般而言「飲食」所承載的大多為地域的文化表徵。近年來，「飲食」逐漸走入「歷史」與「政治」的文學書寫範疇裡。本文主要想要叩問飲食書寫如何承載歷史與政治的想像，進而去探討「食物」在面對歷史的變革下，如何發揮其作用。因此，本文選取了三個在不同地域寫作，處於不同的歷史節點的小說去進行論述，分別為金枝芒《飢餓》、陸文夫《美食家》以及莫言《酒國》。三者面對不同的政治歷史事件下，不期然地皆運用飲食作為文學意象來回應當時的政治氛圍，其中有值得玩味之處。本文最後將討論「飲食」如何擁有這個文學潛能，作為一個特殊的意象去操作或影響歷史帶動歷史與政治的反思，並希冀以此來拓展李亦園所提出的「飲食文化理論圖像」。

關鍵字：飲食文化、歷史政治、金枝芒、陸文夫、莫言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一、前言

「食物不只是好吃的，而且也是好用作思考的。」¹

——李維斯托《今日的圖騰主義》

食物在文學文本當中，可作為一種象徵呈現出多元的面貌。李亦園曾提及，飲食文化的學術領域研究包括「實用面」與「表達面」，其中表達面包含「美學面」與「社會文化面」。其文章〈中國飲食文化的理論圖像〉就曾提出了「食物所蘊含及能藉以表達、延伸、徵象的無形意義，是更為重要的」，²因此他在文章中分析了食物所代表的社會文化面，包括食物所得以象徵的社會地位、身份與地域認同，以及食物與宗教、性、禁忌、健康等關係。除此之外，文學中的飲食書寫，大多透過飲食來作為一種地域的文化表徵，除了凸顯當地美食之外，同時也得以用作懷鄉的書寫，或是作為品鑒與享受之物來進行觀照。

除了上述的文化表徵之外，近年來「飲食」也逐漸走入「歷史」與「政治」的文學書寫範疇裡。許多論述者皆從「飢餓敘事」這方面來進行討論，這與中國現當代的歷史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王德威就曾指出，飢餓敘事模式可上溯至魯迅的〈祝福〉，其後在革命時期以及左翼敘事裡皆有許多小說承繼此系譜，一直到路翎《飢餓的郭素娥》（1943）達到高潮。³左翼敘事裡強調「飢餓」的書寫，除了指證物質資源的匱乏，也讓人們意識到社會資源分配所造成的不公，進而去抗衡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平等，徹底地實踐共產主義。因此，「食物」才會作為一種匱乏的指證，被納入到敘事裡。除此之外，中國在 1940 年代與 1960 年代連續出現的大饑荒，也讓人民心有餘悸，因此有部分文學作品以此作為母體，將「飢餓」寫入小說當中，⁴以此呈現社會現實，或是對歷史與政治有所指涉。另一方面，「吃」與政治、歷史等牽扯上關係，最大的影響當然是來自於魯迅。魯迅提出了「禮教吃人」，且在眾多小說與

¹ 李維斯托（Lévi-Strauss）的原文為法文“Les espèces sont choisies non comme bonnes à manger, mais comme bonnes à penser”，英譯應當是 “We can understand, too, that natural species are chosen not because they are "good to eat" but because they are "good to think.””中文其實並非如引文所說，是李亦園翻錯了。但誤讀之下，或許可引來些許值得思考之處。見李亦園：〈中國飲食文化的理論圖像〉，收錄於《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2000 年），頁 3。

² 李亦園：〈中國飲食文化的理論圖像〉，頁 2。

³ 王德威：〈三個飢餓的女人〉，收錄於氏著《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 年），頁 205-207。

⁴ 如阿城《棋王》（1984）、張賢亮《綠化樹》（1985）、王蒙《活動變人形》（1985）、劉恆《狗日的糧食》（1986）等，不一而足。

散文當中不斷地提出了「吃」與「被吃」等概念，將文化化身為魔鬼，將大眾視為被吃食的對象，「食物」的寓意在此進行了另一層次的轉換。

上述兩種論述，皆並未把「食物」或「飲食」視為其首要的討論目標，「飲食」充其量只是一個不得不用，或恰好可以被運用的意象。本文主要想要延續這幾個大框架，進而去探討「食物」在面對歷史的變革下，如何發揮其作用；「吃」與「食」，究竟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動能，來帶動歷史與政治的反思。歷來皆有論述以此作為取徑，分析如焦桐與梁秉鈞的飲食詩等。⁵至於針對小說的分析，或許僅有魏美玲〈「文革」書寫中的飲食〉，主要探討書寫文革時期的小說中的飲食特徵，但並未強調其中與政治或歷史的關係。⁶

本文擬透過分析金枝芒《飢餓》、陸文夫《美食家》以及莫言的《酒國》，來探討三篇小說如何，或為何需要運用「飲食」來作為文化符碼或意象，去講述當時的歷史變動與政治變革。這三本小說皆寫於歷史的轉捩點後，且不約而同地以「食物」作為其主要的意象，針對當時的時局進行回應。在此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吃」作為一個進行式的動作，與「食物」作為物質文化的表徵，兩者有著「行為」與「物質」上的關聯，但在小說中或有著更為細膩的區別，去反思歷史事件、反映當時殘酷的革命情境、或是象徵著一種文化概念。本文最主要要叩問的是，「飲食」如何擁有這個文學潛能，作為一個特殊的意象去反映歷史？為何一定是以「飲食」作為文學意象來進行操弄？因此，本文選取了三個在不同地域寫作，處於不同的歷史節點的小說去進行論述，或許可以以此來拓展李亦園所提及的「飲食文化理論圖像」，思考「飲食」作為文學意象，在面對歷史與政治時的特殊性。

二、飢餓的革命，革命的飢餓

金枝芒（1912-1998），原名陳樹英，曾以殷枝陽、乳嬰、周容等筆名著稱。⁷他出身於江蘇常熟農村，中學期間即參加學生運動，其後在 1930 年代來到了馬來亞，從事華文教育工作，日治時期加入馬來亞共產黨。其小說《飢餓》寫於 1950 年代，曾於 1960 年油印出版，⁸主要講述 14 位馬來亞共產黨人士在抗英的同時，如何遭受飢餓的磨難，最後只剩下五位戰士，突破重圍獲得救援。

⁵ 胡錦媛：〈食色經濟學：焦桐《完全壯陽食譜》〉，《中外文學》第 31 卷 3 期（2002 年 8 月），頁 9-26；張雅雯：〈梁秉鈞飲食詩書寫——以《蔬菜的政治》為例〉，《臺灣詩學學刊》26 期（2015 年 11 月），頁 167-189。

⁶ 魏美玲以文化傳統的消解、「苦難歲月的咀嚼」、「世態人情的彰顯」來分析小說中的飲食特徵，見氏著〈「文革」書寫中的飲食〉，《中國現代文學》第 14 期（2008 年 12 月），頁 111-128。

⁷ 〈前言〉，收錄於金枝芒：《飢餓》（吉隆坡：21 世紀出版社，2008 年），頁 III。

⁸ 見書中目錄前的圖片，有其出版資料。參考資料同前注。

小說以《飢餓》為名，顧名思義，當是在敘述革命人士如何在飢餓的苦難之中生存下來。正如前言所述，「飢餓敘事」在中國早有先例，然而「飢餓敘事」來到了南洋後，卻開展出了有別於中國的寫作模式。這部小說有趣的地方在於，雖然他是寫於馬來亞獨立以後，且小說背景皆發生在馬來亞，然而其中所書寫的共產黨，其背後所代表的革命理念，皆是從中國一脈相承的。我們不妨將小說視為當時中國左翼小說來到南洋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作為失落的理念與遺產來呈現所謂的「境外書寫」。而小說的特殊之處在於運用「食物」作為意象的方式，「食物」在這部近四十萬字的小說當中經歷了多重的轉換。

小說的背景始於英軍的「畢禮斯計劃」(Briggs Plan)，⁹致使躲入森林中的馬共成員無法與親人或支持者取得聯繫，也因此無法獲得珍貴的資源。作者主要以寫實主義的方式進行書寫，企圖透過描寫飢餓，寫出共產黨員的堅韌不拔，在考驗中堅守自身的政治與救國信仰。小說於是設置了一個極端窮困的場景：所處在的森林物資(如動植物)極端匱乏、當時的季節並不盛產任何蔬果、十幾個人中有老弱病殘、且對森林毫不熟悉。由此，小說中更凸顯食物的難得，也藉著如此艱困的環境，表達革命人士的熱忱以及對共產主義的忠貞不二。¹⁰

與「飢餓」此主題相襯，「食物」一開始是作為革命者的「希望」出場的。他們堅信，只要有了食物，就會有力氣、就能夠聯絡到群眾與組織、就能夠繼續革命下去。小說大半部分都在朝著這方面去進行敘事，如「蠻仔走得也很辛苦……餓得腳步很沉重。不過，達到了出發執行任務的目的，想著要爬著去見群眾、拿糧食，原來無憂無慮的心頭，更像滿杯的水一樣流溢著喜悅了。」¹¹其中，一些時候若有更好的糧食可以吃，革命者們也會為之振奮，如喝帶有糖精的水為「仙丹妙藥」，¹²吃椰漿煮檸檬為「吃大餐」¹³等。然而，「食物」在象徵希望的同時，逐漸成為了一種

⁹ 1948年因左翼反英抗爭趨於尖銳，英殖民政府於六月宣佈緊急狀態，展開大逮捕，與馬共的內戰爆發。1950年始，為切斷鄉村華人對馬共游擊隊的後勤補給，英政府啟動畢禮斯計劃(Briggs Plan，當時的馬共或稱之為「餓斃計劃」。數年內，超過五十萬的華人(其時華人人口的四分之一)墾殖民被迫遷入戒備森嚴的新村(時人稱之「集中營」)以集中監控，從糧食到行動都被軍警嚴密監視。參黃錦樹〈最後的戰役——論金枝芒的《飢餓》〉，收錄於氏著《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臺北：麥田，2015年)，頁320。

¹⁰ 好比玉蘭對蠻仔說：「對，連野菜也沒得吃的飢餓能忍受，就是一個革命戰士的光榮啊！」，以及石古說道：「現在這個時候，難道是靠一點山芥菜來爬集中營的么？山芥菜是靠不住的，現在要靠我們的一股革命幹勁了……我十天八天不吃也爬得！……完成任務是靠我革命的居心。碰到敵人，我的心就燒，我的血就熱，不管我餓著還是病著！」書的前半部分大多充斥著類似的言語，作為一種左翼的教條存在。金枝芒：《飢餓》，頁92-93。

¹¹ 金枝芒：《飢餓》，頁137。

¹² 金枝芒：《飢餓》，頁115。

¹³ 金枝芒：《飢餓》，頁152。這裡的檸檬應當是棕櫚。

負擔，或更像是成為了一種慾望的指涉。革命者的身體在小說進行的同時逐漸崩潰，飢餓開始入侵，對於食物的慾望進而充斥著革命者的生活周遭。小說開始大量地描述革命者如何去採集食物、尋找食物；¹⁴同志們開始抵受不住飢餓，不斷地講述自身面對飢餓時的痛苦，其中以小良與蠻仔為最：

小良：「飢餓一來，他那脆弱的身體不堪戕傷，最先一個倒在床上了。以後，飢餓越來越厲害，身體越來越虛弱」¹⁵

蠻仔：「檸檬原已砍得所剩無幾，天亮出門天黑回，還不足半飽……野菜吃不飽，飢餓蹂躪越發猖狂……蠻仔常常在玉蘭面前嚷著肚餓、肚痛……（蠻仔）餓得跑不快，氣起來索性使出最後一點力，拔腳奔跑，跑上二三十步，昏倒在山坡上，口吐白沫」¹⁶

蠻仔抵抗不住飢餓的部分尤其多，當部隊面臨糧食短缺的時候，最為年輕的蠻仔開始耐不住飢餓。當玉蘭（蠻仔的姐姐）叫蠻仔多忍耐一下時，他卻回答道：「餓起來就是忍耐不得！」於是「飢餓的火焰越燒越旺，灼得人皮膚痛、皮膚焦了」。¹⁷在此，左翼敘事中一向所重視的「高大全」形象逐漸崩潰，缺乏食物的飢餓感逐漸充斥在每個人的身心，不斷地腐蝕他們。值得注意的是，整部小說其實並沒有發生過他們會因為「飢餓」而致死的場景，革命者也並未餓得需要吃樹皮、吃人肉等，他們大多數時候是處於一個循環：因為糧食不足而需要出去找食物——找尋食物時太餓，發生了一些事情——找到食物，暫時充飢。一個講述如何抗爭、革命的故事，開始演變成了一個不斷找尋食物的小說。就連革命隊伍裡的許多生活細節都離不開「食物」，彷彿革命裡就只剩下找食物，彷彿革命的最終意義就只剩下食物。

於是，食物從「希望」的象徵成為了一種「慾望」的對象：革命者不斷地去追尋食物，雖偶爾得以填飽肚子，但永遠無法得到滿足。他們所做的一切都離不開食物，食物逐漸成為了一個揮之不去的魅影般的存在，如影隨形。食物已不僅僅只是一個填飽肚子的象徵，而且還逐漸轉化為一個不斷被追求的慾望，甚至因為「過度追求」而帶來了死亡。這部分以小良與石古等人尋獲鹽的地方為最。小良與石古、蠻仔在許久未能吃到鹽後第一次品嚐鹽，開始時竟認為鹽是「甜的」；其後，小良因過度飢餓而想要吃多一點鹽，但結果越吃越想吃，從一開始所追求的「飽足」感（「因

¹⁴ 諸如採集棕櫚與椰子的場景，大約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

¹⁵ 金枝芒：《飢餓》，頁 160。

¹⁶ 金枝芒：《飢餓》，頁 254。

¹⁷ 金枝芒：《飢餓》，頁 255。

為飢餓使他只想吃個飽」)，到最後竟成為了追求「痛快」的經驗：¹⁸

「越吃，吃個爽快的念頭就越強烈。三個手指抓一把鹽吃下去的時候，他多少嘗到了那久已忘記了的而又久已飢餓的鹽味了……吃個爽快的念頭，籠罩了他心頭的一切思想……吃，吃，爽快地說，吃得他……把整隻手伸向鹽罐去，一把把地抓來吃了。一直吃到甜味不見，鹹味也跟著不見，味覺根本消失了，神經被麻痺了，可還一把又一把地抓著往嘴裡塞進去。」¹⁹

食物從一個能夠裹腹、填飽飢餓，以便於去進行革命的意象，轉化成為了一種「死亡驅力」，²⁰一種無止盡去追尋的象徵，以至於當隔天早晨石古與蠻仔看到小良時，其「嘴巴開開，像個深不可測色洞穴。牙齒和嘴唇之間，甚至兩個鼻孔都塞滿了鹽；下巴、額頭、吊床上都散落著鹽粒；一隻垂落在胸前的手還握著半把鹽。兩隻眼睛還張得大大的，卻盡是白茫茫的顏色。床邊，鹽罐還打開著」。²¹作者透過描繪如此慘烈的死狀，寫出因為對於追求食物的慾望過度而導致的死亡。整部小說中並未有真的餓死，其原因在於其實豐饒的森林裡有許多東西都可以吃，只是這一批革命者並沒有足夠的知識去辨認什麼東西是可吃的，偶爾也會因為吃不熟的植物而昏厥；²²然而在小良之後，有越來越多革命者因為進食而死，「食物」作為「慾望」以及「死亡驅力」不斷地展現在小說當中，好比永興因迷山而被迫吃小波拉樹的嫩葉，結果腹瀉而亡；才伯因為要把桂香埋起來而生吃竹筍，最後口吐白沫而死。²³阿冬的例子更具有反諷意味。他原是負責與群眾進行接洽，企圖帶回多一些糧食給革命者，而

¹⁸ 在此借用拉岡 (Lacan) 針對「痛快」(Jouissance) 的一詞的解釋進行分析。拉岡將「痛快」與「快樂」(Pleasure) 進行區分，其中提及了黑格爾講述關於「享受」(enjoyment) 與「快樂」的區隔。快樂原則的作用在於限制享受，它是命令主體「享受越少越好」的法則。同時，主體不時會企圖逾越加諸在他個人享受上的各種禁令，嘗試超越快感原則。若承受一定範圍的快感，則還在「快樂」的範疇當中；一旦超越了可承受範圍，則成為一種帶有痛苦的快樂，即「痛快」。「痛快」一詞帶著一種弔詭的「痛苦的快樂」之意。參狄倫·伊凡斯 (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臺北：巨流出版，2009年)，頁 151-153。

¹⁹ 金枝芒：《飢餓》，頁 178。

²⁰ 死亡驅力 (Death Drive) 一詞指的是主體不斷想要突破快樂法則，以便獲得「超出」(excess) 的痛快的慾望。參狄倫·伊凡斯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頁 152-153。

²¹ 金枝芒：《飢餓》，頁 178。

²² 此現象以蠻仔為最，原因是因為他最耐不住飢餓。他曾經因吃石螺、蜈蚣、生竹筍、山芥菜、銀芋荷等而吃到口吐白沫，昏厥過去。其他成員除了在極端的情況下，則較少會發生此事。

²³ 才伯的死狀同樣也是驚心動魄：「老人咬著竹筍的嘴粘滿了白沫，鼻孔流出的血黏住了花白的鬍鬚；大大小小的螞蟻，成千上萬地爬動著，幾乎蓋滿了黃蠟色的臉；兩隻腫成一條縫的眼睛，不只沒合上，反而更大地睜開著」。作者近乎殘酷地細緻描繪了才伯的死狀，而害死他的食物仍殘留在嘴巴邊的描寫，更凸顯了食物作為「慾望」但又帶來「死亡」的象徵意涵。金枝芒：《飢餓》，頁 330-333、341。

群眾因體恤阿冬數月未能吃好的，於是準備了白飯和豬肉給他吃。未料到阿冬太久沒有吃油膩的食物，腸胃無法承受豬肉的油膩，因此在過河時阿冬的肚子開始絞痛，致使他與糧食皆被大水沖走。除此之外，他也因為所扛的糧食太重而導致手臂無法出力，才會那麼容易被水沖走。阿冬的死，是被群眾的食物所害，也是被革命者的糧食所害。若阿冬願意把糧食扔掉，就可以出力，可以保證自己的生存，進而持續地進行革命。然而阿冬對於食物的慾望過於執著，因此才會導致他的死。

到了後來，整部小說的意圖開始模糊：究竟是為了革命而活，還是為了食物而活？革命與食物之間，孰重孰輕？食物在小說中，甚至上升到了如神靈般的存在——只要有了食物，萬事萬物就能夠達成，而食物，就是救贖。²⁴這可以從眾革命者如何對待鹽看出端倪：

玉蘭和青蓮是用兩個手指夾著那粒鹽頭，吃幾口淡而無味的野菜，然後伸出舌頭在鹽頭上舔那麼兩舔，把那無窮鮮美的鹽味細細辨嘗了一番，再吃幾口野菜……最後，又像繡花那麼細心，久久地舔著那兩個漬有鹽水的指頭。……蠻仔拿到鹽頭，摘張樹葉在旁邊放著，一心一意埋頭吃野菜，有時吃了一桶再舔，也從不中途觸動。直到野菜吃飽或不飽也吃完了，然後才小心地拿起那張樹葉來，用兩個指頭把鹽頭夾起，先舔舔樹葉上放過鹽的所在，才把鹽頭放進嘴去，可還是舔過了那拿鹽的手指，才讓鹽頭在嘴裡慢慢融化，並且閉上眼睛來享受那甜津津的神奇美妙的鹽味。²⁵

眾革命者在約莫半年的時間後，首次品嚐到鹽味，因此十分重視每天所分配到的那一粒鹽。然而，如此細膩地描繪吃鹽的過程，甚至比描寫抗爭、革命時還要更為細緻；對待鹽的態度，甚至比他們找到群眾與找到組織時，來得更為虔誠、激昂。²⁶革命的話語面對飢餓的身體時，彷彿只剩下空洞的口號，一處處的「報仇！」、「抗爭！」的前提皆是「如果我們找到了食物……」、「如果我們有足夠的糧食……」、「我們先填飽肚子……」。甚至到了結尾處，僅剩五個人還存活著去尋找組織時，他們念茲在

²⁴ 「希望」與「救贖」不同，食物作為「希望」的象徵，其終極目的是為了革命；然而若食物是「救贖」的話，其終極目的是「食物」自身，而並非是為了革命。

²⁵ 金枝芒：《飢餓》，頁 246。

²⁶ 老劉與陳月等人找到阿昌嫂，獲得組織的消息時，並未有任何情緒的波動；而從群眾處獲得米時，小說用了約五頁來描寫革命者得到了米的興奮之情，形容吃粥的樣貌：「（蠻仔）把五斤裝桶放穩了，首先低頭嗅了好一會油鹽粥香，然後半湯匙半湯匙地慢慢舀著吃。粥可不比野菜哪，一下子吃完了豈不太可惜？吃呀吃的，那粥竟然成了他久別重逢的朋友，熱烈地和它談心敘舊起來了」，但當提到革命事業與被英軍殺害的內應時，只說了一句「我要替他們報仇！」，其中孰輕孰重，當可知曉。金枝芒：《飢餓》，頁 304、334-338。

茲的，同樣還是對食物的慾望以及對飢餓的恐懼，甚至還超越了革命：

蠻仔：「有什麼事情比飢餓更艱難困苦呢？最倒霉的是飢餓，餓得你要跑跑不得，要做做不得，要睡睡不得，像在油鍋裡被煎熬著，一肚子悶氣無處可出。餓得慌了，亂吃東西，這個來對你批評，那個來朝你落淚，真是……」
石古：「說得有道理！吃飽了飯，幾長的路跑得，幾重的東西背得，幾苦的工作做得，打起仗來更是生龍活虎。但是，飢餓了，跑一點路也冤枉，做一點工業辛苦，連野菜都沒人去找。摸群眾、爬集中營、打仗，幾危險我都沒放在心上，可是，餓肚子，老實對你說，我也覺得可怕。」²⁷

雖然小說結局依然朝向五名革命者成功獲得救援，到新的地方去進行革命、且小說中時不時也會借眾人之口喊一喊革命口號，但「革命」似乎已淪為空洞的符號。小說中除了有一小部分提到抗英之外，真正著重描寫且具有意義的，恐怕還是尋找食物的過程以及吃壞東西的死狀，「食物」對於革命者的魅惑已遠大於「革命」自身。在此需要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作為一名寫實主義小說家，金枝芒為何要這樣寫？這或許需要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去進行理解。

金枝芒於三〇年代就來到了馬來亞從事教育工作，當時的他秉持著宣揚左翼理想的信念，相信通過抗爭，能夠為人民帶來福祉。因此他也參與了當時的抗爭，從抗英到抗日再回到抗英。然而，1955年華玲會談之後，馬共與其後的馬來亞新政府談判破裂，無法達成共識，因此被迫回返森林，企圖透過游擊戰奪取政權，爭取解放馬來亞。到了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正式獨立，不再受到英殖民者的統治。此即為本文所提出歷史的節點：建國之後的馬共，似乎失去了抗爭的目標。萬惡的「殖民者」已然消逝，馬共失去了反帝反殖民的目的；而新任政府也不承認馬共的合法性，於是抗爭的對象是否轉向成功建國的新政府？或是要為了左翼理想，為了國際無產階級而進行抗爭？其中的理念開始分崩離析，「為何革命」的問題或許也留存在眾共產黨員的心中。

這本寫於五〇年代的小說，於1960年油印出版，正是處在馬共的訴求開始變得不明確的時候。小說中的革命者志在抗英，然而放置在1957年以後出版，似乎失去了其正當性與有效性。小說從一開始強調「抗爭」，一直寫到最後，卻竟是大篇幅的對於「死」與「食物」的追尋，「革命」終淪為空洞的口號。在此或許可以說，「寫實」的文字已然無法承載革命的合法性；或恰恰好可以說，正是因為「寫實」，所以

²⁷ 金枝芒：《飢餓》，頁367。

才會呈現出革命的敗亡。「寫實」與「革命」的理念，恰恰好正是中國在當時最廣為被境外所吸納的理念。由此一來，中國在境外的理念輸出，至此於馬來亞的成立而敗亡。雖然直到 1989 年以後，馬來西亞共產黨才算正式瓦解，但間中的革命僅是零星的抵抗，並沒有太大規模的威脅。革命作為一種大他者（the Other），在馬來亞的成立後，或許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此逐漸消亡。「食物」作為慾望將之取代，成為替補物（supplement）。然而這樣的慾望卻永遠無法被滿足，不斷靠著不同的食物去進行延異（différance）。只有在死亡驅力的驅動下，慾望逐漸升格，一直到「死」，方有可能得到解脫。

三、「美食」的文化建構

「食物」用作於勾勒出境外理念輸出的失敗，回到了中國，「食物」如何與政治進行聯繫？陸文夫《美食家》寫於 1983 年，此作品在中國與許多國家皆大獲好評，除了被評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獲獎作品」²⁸之外，其被翻譯成英、法、日等多國語言後，也在法國與俄羅斯等地賣得相當成功。²⁹這不禁讓人思考，一本名為《美食家》的書能夠獲得如此好評，其原因何在？「食物」在小說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故事主要從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去進行敘述：「好吃者」朱自治，以及一心以左翼為理想、反對「好吃」的敘事者高小庭。³⁰小說以吃結篇，分別選擇了國共內戰前後、大躍進時期、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後的「新時期」等幾個時間段，展示高小庭與朱自治之間兩套話語體系的衝突。高小庭本是朱自治的租戶，但他卻看不慣朱自治的「好吃」，於是立志要打倒這樣的「階級敵人」。小說緊貼歷史脈絡來進行敘述，朱自治的飲食習慣也是與歷史一起載浮載沉：在國共內戰前，朱自治是一個富豪，愛吃精緻的食物；到了三反五反時期，朱自治雖然沒有被鬥倒，但也開始較為收斂；到了大躍進以及文革時期，朱自治過得最為痛苦，從以前的不可一世到要去跟別人搶蘿蔔來吃。敘事者高小庭的一生同時也與「吃」脫不了關係，他雖然在文革前曾為黨國貢獻不少，然而由於他過於崇尚理想的社會主義，認為應當人人平等，因此

²⁸ 唐余俊：〈從《美食家》看姑蘇美食文化及其它〉，《揚州大學烹飪學報》第 3 期（2001 年），頁 18。

²⁹ 高建國在其文章中提及，「《美食家》」法文版於 1987 年出版後，在法國銷售了超過十萬冊，並被認為是在法國最暢銷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俄羅斯漢學家羅流沙則介紹到，蘇聯解體後的所有被譯介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出版次數最多的單本作品，就是陸文夫的《美食家》。見氏著：〈《美食家》人物塑造的原型考察與文化分析〉，《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14 年），頁 48。

³⁰ 這裡的「好」應當是「吃」，為「嗜吃」、「愛吃」之意，然而好吃者朱自治同時也只喜歡美食，高小庭也同時反對美食，因此這裡的「好吃」同時具有雙重意味。

在反對朱自治的「好吃」的同時，也極端地認為凡是吃好的就是資產階級。正因如此，他受到了同行的歧視，在文革期間甚至與朱自治一起被批鬥。文革之後，事情進行翻轉，內戰前對於「吃」十分講究的朱自治反而被聘請為講師，成為烹飪界的權威；而忠心為黨國付出的高小庭，則連烹飪學會的理事長也無法擔任，最後比朱自治還更為潦倒。

賴英曉在其博士論文中，將高小庭對朱自治的改造視為「社會主義語境下精神對身體控制的嘗試」，³¹高小庭站在一個「反剝削」的立場，認同精神對肉體慾望的克制，讚同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形態。然而這樣的改造註定是失敗的，因為味覺在本質上是沒有階級差別的。³²《美食家》中所帶出的，是「身體的自然慾求並不能完全被高揚的精神所遮蔽，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也只能歸於失敗」。³³也正因此，「小說敘事就這樣以「味」的人類的無差異的普遍需求顛覆了政治改造的虛妄和荒誕。由此，社會主義的價值評判體系——國家、集體、革命等大範疇對個人小範疇的超越和凌駕就被宣佈為無效」。³⁴延續此一論述，這部小說的歷史節點正是文革之後、改革開放才剛開始起步的 1983 年，中國當時的現實環境在面臨了社會主義的崩潰後，需要一個新的價值評判體系。《美食家》所提供的，表面上正是企圖以「飲食文化」來作為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小說中提出了「文化大革命可以毀掉許多文化，這吃的文化卻是不絕如流」；³⁵除此之外，眾多論述也聚焦在小說中的「蘇州美食文化」來進行討論。³⁶不可否認，小說中的確多處提到蘇州飲食文化，這也與陸文夫本人的背景相關。陸文夫素有「陸蘇州」之名，他雖然不是蘇州人，但自小在蘇州求學，生活了將近 60 年，對於其中的文化當是十分熟悉。小說中的確也提到了一些蘇州名菜，諸如芙蓉雞片、雪花雞球、菊花魚、松鼠鱖魚、蜜汁火腿、蟹粉菜心、冰糖蹄膀等，另外還有蘇州的「天下第一菜」，以及一些食物的食譜、烹調方法、擺

³¹ 賴英曉：《饑餓敘事的意識形態建構》（上海：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5 月），頁 115。

³² 正如小說中所提到：「那資產階級的味覺和無產階級的味覺竟然毫無區別！資本家說清炒蝦仁比白菜炒肉絲好吃，無產階級嘗了一口之後也跟著點頭。他們有了錢以後，也想吃清炒蝦仁了。」見陸文夫《美食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頁 43。

³³ 賴英曉：《饑餓敘事的意識形態建構》，頁 116。

³⁴ 賴英曉：《饑餓敘事的意識形態建構》，頁 116。

³⁵ 陸文夫：《美食家》，頁 37。

³⁶ 如金紅：〈「雙重觀看」——陸文夫《美食家》文本意蘊解讀〉，《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7 年），頁 60-63；何清：〈「蘇州形象」的文學表達——陸文夫創作的另一種意義〉，《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7 年），頁 64-68；張盈芳：〈陸文夫《美食家》品讀〉，《新世紀圖書館》2006 卷第 5 期，頁 78-80；高建國：〈《美食家》人物塑造的原型考察與文化分析〉，頁 48-55、〈走進小說的蘇州美食——陸文夫與美食文化（一）〉，《江蘇地方志》第 4 期（2015 年），頁 30-35；唐余俊：〈從《美食家》看姑蘇美食文化及其它〉，頁 18-21。

盤等等，〈走進小說的蘇州美食〉一文甚至還圖文並茂地介紹了小說中的蘇州美食。³⁷小說中的「食物」作為「文化」的一種，在當下看似得以補缺文革以後所遺留下來的巨大文化空缺。

然而，小說雖透過不斷強調「飲食文化」來建構新的評判體系，但卻有意無意地將歷史創傷盡量地淡化、掩蓋、抹平。小說中出現了兩次提醒高小庭要保護蘇州飲食文化，否則就要「為歷史負責」：

「蘇州的吃太有名了，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文化，如果把這種文化毀在你手裡，你是要對歷史負責的！」³⁸

「這樣珍貴的材料如果不及時搶救，那是要對歷史負責的！」³⁹

把「飲食文化」毀壞掉，需要負上歷史責任，然而國家或政府所帶來的災難、所造成的文化迫害，小說中卻只字未提，或僅僅是略為帶過。好比在講述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時，小說中僅提到「我與全家下放到農村去了九年……足夠我進一步思考吃飯的問題。」，接著便直接來到了「災難過去之後，我又回到了蘇州」，⁴⁰將之輕易地揭了過去。「食物」與「飲食文化」的衰亡是需要負上歷史責任的，但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破壞，則無從提起。更有甚者，是透過「食物」或是「吃」的動作，就得以抹消這些歷史傷痕：

「文化大革命和困難年也是不好過的」

「算啦，那些事情都過去了，吃吃！」

「是呀，將來到了共產主義，我們大家天天都能吃上這樣的菜！」⁴¹

「蘇州飲食文化」在此，與其說是作為「新中國」的文化指標，倒不如說是一種掩蓋歷史錯誤的方式。雖則有論者將《美食家》歸類為「反思文學」，⁴²但從文本當中可看出，其針對歷史的反思與批判其實並不明顯，甚至還有意遮掩。食物與其中的文化在此即是最為重要的主角，歷史與其中的錯誤卻被放置到了背景，或甚至僅是稍微被提及而已。除了在文本內部呈現運用美食來抹消記憶的境況，在文本之外的評論界同樣也是如此。大部分論及陸文夫《美食家》的論述，皆強調小說中精緻地

³⁷ 高建國：〈走進小說的蘇州美食——陸文夫與美食文化（一）〉，頁 30-35。

³⁸ 陸文夫：《美食家》，頁 44。

³⁹ 陸文夫：《美食家》，頁 73。

⁴⁰ 陸文夫：《美食家》，頁 62。

⁴¹ 陸文夫：《美食家》，頁 87。粗體為筆者所加。

⁴² 金紅：〈「雙重觀看」——陸文夫《美食家》文本意蘊解讀〉，頁 61。

形容蘇州飲食文化之處。⁴³這本書得以在國外如此暢銷，恐怕同樣也是強調其中的飲食文化。如此竟呈現了莫大的諷刺——歷史輕易地被飲食文化所取代，撫平，彷彿只要能夠吃，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最大的反諷出現在小說的第十一章。朱自冶在文革之後，由於他的「好吃」而被聘請為一名講師到處去進行演講，也成為了新成立的烹飪學學會的一員。其名聲越來越響亮：「一個老專家，在十年浩劫中寫了一本書」，⁴⁴其後也開始編寫講義，讓各地的廚師進行參考，學習。然而，當高小庭看了這份講義後，卻「發現這本由朱自冶口述，包坤年整理的大作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是從幾種常見的食譜中抄錄而來的，而且錯漏很多，不知道是抄錯的還是印錯的」。⁴⁵在最後的酒席的時候，高小庭向孔碧霞（朱自冶的妻子）詢問，為何沒有南瓜盅這道菜。⁴⁶孔碧霞咯咯地笑了：「你聽他瞎吹，他這人是宜興的夜壺，獨出一張嘴！」⁴⁷在這裡我們終於了然，原來好吃、愛吃、嗜吃的朱自冶，竟然不會煮，也不會寫食譜。其終其一生其實並不會「吃」，而只是會「享受」。這一切都是虛構的，或是被建構出來的。一個不會煮、只會吹牛，就連演講時也只會講「放鹽」的人，竟然在引領著整個蘇州美食文化的烹飪界。頒給朱自冶的種種殊榮，終歸只是一場騙局。

這也讓我們產生一絲疑惑，若把這樣的一個角色當做是中國在文革之後的文化傳承典型，那麼這樣的「飲食文化」是否真的得以補足文革後的文化空缺？文本在此弔詭地展示出：不能。其實就連「美食家」之名，也是「外國」所發明的詞彙，⁴⁸中國並沒有一個名字來稱讚「愛吃」的人。小說中說到「吃的專家」是罵人的，「會吃專家」也不通」，⁴⁹最終只能夠以外國人所發明的詞彙來稱讚朱自冶，其「辛辛苦苦地吃了一世，竟然無人重視，尚且有人反對。真正的價值還是外國人發現的！」⁵⁰這不啻顯示了，中華文化本身其實並沒有讚賞或著重「飲食文化」的底蘊。整個中國文化都無法形容朱自冶這樣一個「好吃」的人，然而借鑒外國詞彙所形容出來的人，卻竟是一個贗品。小說所展現出來的，到頭來其實是「中華飲食文化」的無

⁴³ 見注 35 的各個論文。

⁴⁴ 陸文夫：《美食家》，頁 76。

⁴⁵ 陸文夫：《美食家》，頁 83。

⁴⁶ 在文革時期時朱自冶過得十分潦倒，需要向高小庭討南瓜來吃。朱自冶用了約三百字來講述西瓜盅與南瓜盅的區別，以及南瓜盅應該怎麼做。見陸文夫：《美食家》，頁 53。

⁴⁷ 陸文夫：《美食家》，頁 91。這裡的「獨出一張嘴」，同時說明了朱自冶只會講和只會吃，卻不會實際操作，帶有雙關意味。

⁴⁸ 趙憲章就曾提到，「美食家」一詞其實是從陸文夫的小說中才開始出現在漢語中的。見氏著〈形式美學之文本調查——以《美食家》為例〉，《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4 年），頁 55 注 2。

⁴⁹ 陸文夫：《美食家》，頁 87-88。

⁵⁰ 陸文夫：《美食家》，頁 88。

力，無法承載文革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空缺。

整部小說的結尾，也十分耐人尋味。小說進行到最後，高小庭回到家看見眾人正在逗他剛滿周歲的外孫，小孩不吃糖，只吃巧克力，「吃得滋滋啞啞地流口水」。人們哄笑起來了：「啊呀，這孩子真聰明，懂得吃好的！」⁵¹然而高小庭看見了外孫的選擇後，便「頭腦突然發炸，得了吧，長大了又是一個美食家！我一生一世管不了個朱自治，還管不了你這個小東西！」⁵²表面上看似在出氣的高小庭，其行為或許帶有更深刻的意涵。小外孫象徵著中國的未來，高小庭這樣的做法暗指飲食文化不能、也無法去承載整個文革後所留下的歷史與文化空缺。整部小說從一開始雖似乎意要凸顯其中的飲食文化，但到了最後，卻透過「飲食」的無力傳承，帶入了更大的歷史文化空缺：「吃」終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無法遮掩曾經所發生的歷史創傷，也無法作為中國未來的文化指標。「食物」作為貫串全書的意象，終究無法真正替代歷史，真正要為歷史負責的，不僅僅是破壞飲食文化的高小庭，同時也是破壞整個中華文化的上位者。畢竟，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四、暴飲·暴食·暴政

如果說《美食家》企圖建構一個以飲食文化為基礎的中國，那麼《酒國》就是將這樣的文化呈現得更為淋漓盡致，也更為不堪入目。高小庭所想要阻止的「美食家」國度，活生生地呈現在《酒國》當中，「吃」與「進食」的慾望充斥在小說文本裡。小說的結構較為混雜，其中分三條線，其一為作家「莫言」所寫的小說、其二為李一斗所寫的小說、其三為「莫言」寫給李一斗的信。第一條線的故事從偵察員丁鉤兒收到了一份關於酒國（中國的一個省份）在吃人肉的密報開始，他獨自到酒國去進行突擊檢查，其後卻無意間參與了吃人肉的饗宴，也與一名女司機通姦。第二第三條線則穿插於故事中，主要介紹酒國的背景與文化。其中，酒國的「吃」可分成兩個階段，其一為吃得太多，慾望的饜足；其二為吃人與吃小孩。

小說透過「吃」所呈現的「慾望」與《飢餓》中的不同，《飢餓》對於食物的追尋是起源於匱乏，不管是生理上的或是精神上的；《酒國》當中則明顯透露出了一種「飽足」，進而衍生出了「過度」、「剩餘」的慾望。李一斗就曾指出，人活著「就是為了吃喝」，而酒國就是能夠提供一切給大家吃好喝好，「讓他們明白吃喝並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生命，而是要通過吃喝運動體驗人生真味，感悟生命哲學。讓他們知道

⁵¹ 陸文夫：《美食家》，頁 92。

⁵² 陸文夫：《美食家》，頁 92。

吃和喝不僅是生理活動過程還是精神陶冶過程、美的欣賞過程」。⁵³小說中的〈神童〉篇當中，透過小妖精之口，說出了當時的人「吃膩了牛、羊、豬、狗、驢子、兔子、雞、鴨、鴿子、驢、駱駝、馬駒、刺猬、麻雀、燕子、雁、鵝、貓、老鼠、黃鼬、猓獺」⁵⁴這裡盡其所能說出了各種可吃的動物，但在酒國的人們卻都無法滿足於此。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小說中所提到的食物都以「陸地與天空的肉」為主，沒有一道菜是非肉的，也沒有一道菜是海鮮類的。這或許可以一窺莫言企圖運用食物作為文化政治的想像——食肉中國。

於是，沒有任何食物得以滿足酒國人們的食慾之後，他們便轉向了「吃人」。但吃人其實是十分講究的，他們不吃成人，只吃小孩，而肉孩是有分品階的，且小說還花了一長串來企圖解釋（或介紹）肉孩為何好吃：

因為我們的肉比牛肉嫩，比羊肉鮮，比豬肉香，比狗肉肥，比驢子肉軟，比兔子肉硬，比雞肉滑，比鴨肉滋，比鴿子肉正派，比驢肉生動，比駱駝肉嬌貴，比馬駒肉有彈性，比刺猬肉善良，比麻雀肉端莊，比燕子肉白淨，比雁肉少青苗氣，比鵝肉少糟糠味，比貓肉嚴肅，比老鼠肉有營養，比黃鼬肉少鬼氣，比猓獺肉通俗。我們的肉是人間第一美味。⁵⁵

除此之外，肉孩該怎麼煮，還有一套規矩：「譬如油炸、清蒸、紅燒、白斬、醋溜、乾臘，方法很多喲，但一般不生吃」，⁵⁶甚至還在課堂上示範如何殺嬰做菜。「吃人」傳統當然溯及至前言所提到的魯迅「禮教吃人」，以及其名言：「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席的廚房」；⁵⁷然而，小說竟將魯迅的寓言化作了現實——把「人」當做一種精緻的食材，成為一道「真正的菜餚」，呈現在酒國當中。除此之外，小說中也提到了中國歷史上真實的吃人事件，如易牙蒸其子獻於齊桓公，以及李逵劉備等吃人肉的故事。在此，原來對於魯迅寓言式的「戲仿」（parody），似乎竟成為了一個真實存在的恐怖場景。莫言為何要如此進行書寫？在此或許要回到莫言的書寫背景進行討論。

《酒國》於 1992 年出版，莫言在 1989 年的九月開始動筆。這樣的時間點帶著強烈的意涵——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數月。天安門事件並非朝夕之事，早在數月以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前的學生們便針對當時的政策進行學生運動，其中除了強調

⁵³ 莫言：《酒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頁 145。

⁵⁴ 莫言：《酒國》，頁 107。

⁵⁵ 莫言：《酒國》，頁 107，底線為筆者所加。

⁵⁶ 莫言：《酒國》，頁 107。

⁵⁷ 魯迅：〈燈下漫筆〉，收錄於《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216。

民主自由，也要求政府公開官員的財產收入等。這一系列的事件是由於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的分配不均，以及官僚制度裙帶體系等等的所造成的。在此，文學可以做什麼？莫言就以《酒國》作為當時中國的社會縮影，通篇運用「食物」與「進食」的意象進行批判。

有別於文革時期的「飢餓」、脫離了改革開放後新文學時期「尋根」、「傷痕」的書寫，《酒國》中強調的是一種鋪張浮誇、絢爛華麗的「過度進食」。這當中所批判的正是政府所積極強調經濟改革與資本主義，由於過度強調經濟發展，進而導致連「人」都被活生生碾過的六四事件。人文主義在此消亡殆盡，所追求的是伴隨著經濟提高的生活水準：「隨著四個現代化的迅猛發展，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吃，已經不僅僅是為了飽腹，而是一種藝術欣賞。因此，烹調已經不僅僅是一門技術同時還是一門高深的藝術」。⁵⁸除此之外，被視為國家未來的「孩子」，在小說當中竟被視為一種食材、甚至僅僅也只是一種用來作為交易的貨物。小說中不斷強調「孩子非人」的情境，好比在《肉孩》篇中幫小孩洗澡時，元寶與其妻子所在意的並非是小孩有沒有燙傷，而是怕燙傷了會影響小孩的品質，從而影響賺得到的錢；販賣孩子簽約時，元寶需要正面承認「孩子不是人」，僅是「一種特殊商品」；⁵⁹在《烹飪課》篇中更是在烹煮嬰兒之前，先灌輸未來的廚師們這樣的「意識形態」：

我們即將宰殺、烹製的嬰兒其實並不是人，它們僅僅是一些根據嚴格的、兩相情願的合同，為滿足發展經濟、繁榮酒國的特殊需要而生產出來的人形小獸。……它們不是人，它們是人形小獸。……它們在本質上與鴨嘴獸沒有區別。⁶⁰

將人商品化，以此為最。除此之外，由於「貨源短缺」，因此若廚師們想要動手試做，可以用猴子與乳豬作為嬰兒的代替。「小孩」從代表著家國的未來，成為了僅僅是裹腹之物，無關乎國家民生。從魯迅《狂人日記》中所強調的「救救孩子」，竟演變成了「吃吃孩子」，且孩子還成為了大補之物。⁶¹這或許也是一種變相的批判：國家肆意屠殺未來的棟樑，所作所為並非為了國家的未來，政府高官只在乎當下的經濟成效，以及個人的口腹之慾。另外，小說中還一步步教導大家該怎麼去煮嬰兒：先放血，「大概一個半小時後，肉孩的血被控乾；第二步，要盡可能完整地取出內臟；

⁵⁸ 莫言：《酒國》，頁 225。

⁵⁹ 莫言：《酒國》，頁 78。

⁶⁰ 莫言：《酒國》，頁 227。粗體為筆者所加。

⁶¹ 劃線部分指出了肉孩除了在味道上比其他的肉還要好，也在品格上比其他肉還要好。吃了肉孩，不僅僅可以帶來健康，還可以端正自身品性，可謂最佳良藥。參見莫言：《酒國》，頁 107。

第三步，用 70°C 的水，屠戮掉他的毛髮……」，⁶²一個活生生的「煮嬰食譜」，呈現在眾人的眼前。如此強調吃小孩的「步驟」及其「用處」，其中所凸顯進而去進行批判的，正是「科學精神」。科學與文明，亦或是所謂的現代性所帶來的，毋寧也是另一個吃人的世界，而這個吃人的世界更為講究，以精細的步驟來思考該怎麼吃人，才能夠獲得最大的價值。楊小濱就此指出，既然美食橫跨了科學與吃人，文明和野蠻的距離由此被徹底取消。⁶³從五四以來所提倡建構的科學理性，發展到極致後竟成為了吃人的幫兇。

小說除了透過「吃」來對當下的政治經濟以及科學理性進行批判，同時也對整個中華文化進行反諷。小說中最明顯的例子為全驢宴中的「龍鳳呈祥」。「龍鳳呈祥」為一道將公驢母驢的生殖器拼湊在一起的菜餚，然而酒國卻將之這兩樣不堪入目之物命名為「龍鳳」，并言及「龍與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莊嚴圖騰，至高至聖至美之象徵，其涵義千千萬萬可謂罄竹難書」。⁶⁴中華文化最高尚之物，竟是公驢母驢的生殖器，其中的嘲諷一覽無遺，中華文化的崇高性消耗殆盡。除此之外，千千萬萬的中華文化當中，「烹煮嬰孩」竟是代表著大中國文化的一大技術，《烹飪課》中師母提到了「只要掌握了這道超水平大菜，你們就等於領到了永久簽證，你們就能征服洋人，無論是美國佬、德國佬還是什麼別的佬」。⁶⁵煮嬰孩竟然還能作為中華技術發揚光大，用以弘揚海外，實為中華文化之光。

除此之外，「吃」與「食物」的影響更是充斥在整個文本語境當中。在形容做愛場面時，丁鉤兒所想的是「這哪裡是做愛？分明是殺豬」；⁶⁶在描繪女性的性慾時，也是用食物的意象來進行描述：「像一隻塗滿各種香料的熊掌，在微火上燉了幾十年，現在，她終於熟透了。她散發著撲鼻的香氣」；⁶⁷而在描寫人的身體時，也用了「驢蹄子一樣結實的小拳頭」、「黑棗般的乳頭」⁶⁸等各種食物來進行書寫。「吃」與「食」在此已溢出了對於政治、經濟、文化的指涉，而滲透到了人的日常生活與身體當中。

「吃食」已並非是單純的從屬性描繪，而成為了具支配性的行為，身邊的一切皆是可食之物，人們不斷地吞噬彼此、咀嚼反芻、并將之無限地消化。酒國，或其所隱喻的中國，真的成為了一座大筵席。

全篇小說運用「吃」與「食」來針對當下時局進行反諷與解構，所帶出的並非

⁶² 莫言：《酒國》，頁 230。

⁶³ 楊小濱：〈《酒國》：盛大的衰頹〉，《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6 期（1994 年 11 月），頁 180。

⁶⁴ 莫言：《酒國》，頁 164。

⁶⁵ 莫言：《酒國》，頁 229。

⁶⁶ 莫言：《酒國》，頁 175。

⁶⁷ 莫言：《酒國》，頁 297。

⁶⁸ 莫言：《酒國》，頁 218。

是一時一地的問題，而更是整個世代整個文化的結構性問題。高層的人由於慾望的不滿足而轉而吃人；烹飪界則有人負責完善食譜，準備烹調手續；底層的人不僅毫無抗拒，同時還主動奉上自身的小孩，害怕自己的孩子賣不到好價錢。應當是作為執法分子的偵察官丁鈎兒也同時參與了吃人的行列，而象徵著革命運動首領的「小妖精」，更是殘暴無比，殺人無數；有著俠義形象的「驢大俠」，竟是「要禽遍酒國美女」的余一尺。小說並沒有指出任何光明的未來，也無法道出任何得以解救的跡象，畢竟就連批判一切的敘事者「莫言」，在小說結尾處也來到了酒國，也同時參與了酒國的盛宴。如果魯迅的鐵屋子或狂人還存在著一絲吶喊的回聲，那麼《酒國》當中指向的就是一種無望的結局——無論多麼地繁華絢爛，終究會導向腐敗，最終所掉入的，僅僅是食物的「剩餘」——糞坑。

五、結論

以上嘗試透過分析《飢餓》、《美食家》與《酒國》中的「飲食」意象，探討「食物」或其中的文化如何作為文學意象，進行政治指涉。在此需要正視的是，為何各個作家都把「吃」或「飲食」當做主要的意象來進行政治隱喻？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直接的關聯？《飢餓》嘗試運用對於食物的慾望來取代革命、《美食家》企圖運用飲食文化來重塑文革後的中國文化、《酒國》則藉由暴飲暴食，極度放縱的飲食想像，來批判政治現實。這其中顯然並不僅僅是巧合。在《酒國》之後，更有位處於政治邊陲的香港作家李碧華所寫出的《餃子》，從一個女性／邊緣的角度思考香港與中國的關係，讓我們看到了「吃」與「政治」之間充滿著更為蓬勃的能量。

在此或許可以提出一個構想。現當代似乎仍未有一套理論針對這樣的「飲食——政治」進行論述，然而「吃」在中華文化具有十分強大的影響力，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獨一無二的中華「飲食——文化」想像，尤其是根據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飲食已滲透在整個文化基底當中，從兩千多年以前的「食色，性也」便已可見一斑。本文嘗試將「飲食」與「政治歷史」放在一起進行討論，或許可以以此來啟發思考。「飲食」作為文學意象，在面對歷史與政治時有其特殊性，自魯迅提出「禮教吃人」的概念以後，這樣的連結顯得更為深刻。然而，到了現當代之後，小說家們紛紛從日常生活出發，開創了另一種以「吃／食」作為一個政治樣態或文化符號的書寫方式。所謂「民以食為天」，「吃飽」本身正是一個民生政治問題，為人民生存的最關鍵問題。一旦人民開始「吃不飽」，政治的權威性就會開始受到質疑。因此毛澤東的革命話語當中，就不斷強調有關「吃飽」的話題，好比在大躍進時期的公共食堂中講「放開肚皮吃飽飯，鼓足幹勁搞生產」；1959年上海會議時說出了「大家吃不飽，

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這樣在現今看來甚為驚悚的話。然而，這樣的說法在當時卻是十分合理的，不但能夠合理化且鞏固共產政權，且只有讓人民安心後，才能夠不斷進行革命⁶⁹。但這樣的說法，卻被上述的幾個文本所打破，從金枝芒開始就已經道出了食物無法真正去支撐革命，而《美食家》則是透過美食文化去遮掩整個文革失敗的歷史語境，《酒國》則是道出了現當代政治已被物慾所支配，「革命」從此瓦解。因此，「吃／食」從作為「禮教」的隱喻，到了現代後此符碼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轉換，這或許是接下來評論者得以積極開拓的面向，並以此來拓展李亦園所提出的「飲食文化理論圖像」。

徵引書目

- 王德威：〈三個飢餓的女人〉，收錄於氏著《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年，頁205-250。
- 李亦園：〈中國飲食文化的理論圖像〉，收錄於《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屆》，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2000年，頁1-16。
- 狄倫·伊凡斯（Dylan Evans）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詞彙》，臺北：巨流出版，2009年。
- 金枝芒：《飢餓》，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8年。
- 金紅：〈「雙重觀看」——陸文夫《美食家》文本意蘊解讀〉，《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7年，頁60-63。
- 唐余俊：〈從《美食家》看姑蘇美食文化及其它〉，《揚州大學烹飪學報》第3期，2001年，頁18-21。
- 高建國：〈《美食家》人物塑造的原型考察與文化分析〉，《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4年，頁48-55。
- 高建國：〈走進小說的蘇州美食——陸文夫與美食文化（一）〉，《江蘇地方志》第4期，2015年，頁30-35。
- 莫言：《酒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 陸文夫：《美食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黃錦樹：〈最後的戰役——論金枝芒的《飢餓》〉，收錄於氏著《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臺北：麥田，2015年，頁315-333。
- 楊小濱：〈《酒國》：盛大的衰頹〉，《中外文學》第23卷第6期，1994年11月，頁175-186。

⁶⁹ 感謝評論人賴珮宣學姐提供關於毛澤東革命話語的建議與修訂。

趙憲章：〈形式美學之文本調查——以《美食家》為例〉，《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2004年，頁54-59。

魯迅：〈燈下漫筆〉，收錄於《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賴英曉：《饑餓敘事的意識形態建構》，上海：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5月。

魏美玲：〈「文革」書寫中的飲食〉，《中國現代文學》第14期，2008年12月，頁111-128。